

明代八股文史

龚笃清 著



国家社科基金「八股文文献整理及八股文史研究」项目（08BZW017）成果
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八股文史/龚笃清著.—长沙:岳麓书社,2015.1

ISBN 978—7—5538—0270—1

I. ①明… II. ①龚… III. ①八股文—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0422 号

MING DAI BA GU WEN SHI

明代八股文史

作 者 龚笃清

责任编辑 杨云辉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20.25

字数:526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978—7—5538—0270—1/H · 57

定价:68.00 元

承印: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001

引 言 八股文经学性的消长构成了明、清八股文史的主要脉络 /001

- 第一节 经学性是八股文的灵魂/004
- 第二节 八股文小题的出现对其经学性的瓦解/012
- 第三节 八股文的文学化倾向对其经学性的削弱/027
- 第四节 时代的变化对八股文经学性的颠覆/035
- 第五节 小结/043

第一章 洪武：为科举选才而创制八股文/045

- 第一节 荐举制弊端引发的改革决心/046
- 第二节 首开科举的失望引发对科举文体的思考/049
- 第三节 再行荐举的无奈改变了朱元璋的人才理念/053
- 第四节 儒家思想的独尊为八股文的经学化奠定了基础/060
- 第五节 重开科举定下“科举成式”/071
- 第六节 为科举取士而创制的八股文及其特点/074
- 第七节 朱元璋创制八股文之目的，在于传输程朱理学以治心/087
- 第八节 洪武年间八股文体式的功用/094
- 第九节 八股文的创始者考析/096

第二章 从建文到天顺：明经义向八股文演进的时期/101

- 第一节 八股文演进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态/101

- 第二节 八股文演进的轨迹/104
- 第三节 演进期八股文概述/118
- 第四节 明代前期的八股文与科举/121
- 第五节 明代前期八股文对文学的影响/128
- 第六节 明代前期的八股文名家及名作/141

第三章 成化与弘治：八股文的成熟期/170

- 第一节 八股文成熟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势态/170
- 第二节 成熟期八股文的状况/172
- 第三节 定型后的八股文格式/181
- 第四节 走向全面成熟时的八股文对社会的影响/190
- 第五节 明代中期最受推崇的八股文大家王鏊/197
- 第六节 与王鏊齐名的八股文大家钱福/207
- 第七节 成化、弘治时的八股文名家及名作/214

第四章 正德到嘉靖：明代八股文的繁盛时期/241

- 第一节 正德、嘉靖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态势及其对八股文的影响/242
- 第二节 正德、嘉靖八股文的形态/247
- 第三节 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与作法开创了八股文写作的新局面/252
- 第四节 八股文在嘉靖中、后期面临的危机与挑战/257
- 第五节 正德、嘉靖时八股文与科举的关系/266
- 第六节 明代中叶的文学与八股文/272
- 第七节 以古文为时文的开创者唐顺之/277
- 第八节 在八股文写作与理论研究上均有建树的茅坤/288
- 第九节 明代八股文四大名家之一的瞿景淳/295
- 第十节 以古文为时文的大师归有光/299
- 第十一节 嘉靖时的八股文名家及名作/308

第五章 隆庆和万历：明代八股文的变革期/331

- 第一节 隆庆、万历的社会环境促成了八股文的文学化变革 /332
- 第二节 隆庆、万历时八股文与科举的关系/338
- 第三节 王阳明学说对隆庆、万历八股文内容和思维方式的影响/344
- 第四节 隆庆、万历八股文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350
- 第五节 贯串隆庆、万历时期的传统派八股文/361
- 第六节 隆庆、万历时各类八股文的特征/364
- 第七节 隆庆、万历年间的古文与八股文的融合趋势/377
- 第八节 隆庆、万历时八股文选评的兴盛/393
- 第九节 隆庆时的八股文大家胡友信/398
- 第十节 才子型的八股文名家汤显祖/402
- 第十一节 讲机法，以“九字诀”传世的八股文名家董其昌 /410
- 第十二节 为人谑浪却为文高洁的王思任及其新奇之小题文 /417
- 第十三节 隆庆、万历时的八股文名家及名作/426

003

第六章 万历末与天启：八股文的全面去经学化时期/465

- 第一节 全而去经学化的原因/466
- 第二节 “空疏庸腐，稚拙鄙陋”与文切时事，慷慨悲歌并峙的天启八股文/471
- 第三节 以善于融会旨趣、发挥理奥而雄踞于天启八股文坛的章世纯/478
- 第四节 被后世称为“文章最高，忠义最烈”的天启八股文大师金声/482
- 第五节 因投降李自成而受到唾骂的八股文名家项煜/490

第六节 天启时的八股文名家及名作/497

第七章 崇祯：明代八股文的起衰振兴时期/513

第一节 在国家危殆之际回归经学化的崇祯八股文/515

第二节 慷慨悲歌、理实恢奇与靡丽空疏之风相对峙的崇祯八股文坛/532

第三节 八股取士对明末科举的破坏/550

第四节 晚明八股文与文学的关系/554

第五节 以振兴八股文为己任的艾南英/558

第六节 才气横溢的八股文高手陈际泰/569

第七节 身名并烈的八股文名家黄淳耀/577

第八节 欲以复兴古学来振兴八股文的陈子龙/585

第九节 崇祯时的八股文名家及名作/595

重要征引参考书目/624

后记 也玩一把表扬与自我表扬/631

引言 八股文经学性的消长构成了明、清八股文史的主要脉络

八股文是明、清应试经义的一种俗称，其名众多。若从内容来分，它有经义、经艺、制义、制艺之称；从其体式特征来分，又有八比文、八脚辞之名；从其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不断变化的特性而言，它又称为时文、时艺；按其刊印的出处来源命名，则有程文、程墨、墨卷、闱墨、房稿、房书、行卷、行书、社稿等；从其题目的来源分，则有四书文、五经文之别；从其与科举的关系来命名，则有举业、举子业、帖括等。八股文众多的名称均可反映出它的某种特征，也表明这种文体的复杂性。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用于科举取士，有着特殊规范的一种解经专用文体，在明、清科举制度中起着灵魂作用，故明、清科举制又称为八股取士制。

八股文产生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语境之中。它是为适应统治阶级以程朱理学统一士人头脑，培养、识别、选拔具有儒家正统观念的人才，以及大规模考试阅卷的需要，在使用过程中，随着文体本身功能的必然扩张，杂糅了中国古代诸多文体的特点逐渐创制而成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工具性。

在明、清两代，统治阶级都把它当作向广大士人传输儒家正统伦理价值观的有效工具。为使其工具效能最大化，统治者对八股文的文体进行了精心设计，将它紧紧捆绑在《四书》、《五经》之上，赋予它众多的经学元素，并以获取功名利禄为诱饵，迫使每个写作者非得熟读《四书》、《五经》及朱熹等理学派代表人物的传注，并设身处地地去体悟经典中字、句、节、章的微言大义，亦步亦趋地按规定的程式逐字逐句地去解析题目，也即经书

中的奥旨妙道不可。

这样，八股文写作实际上便成为儒家经典传注的一种文化复制。在对儒家经典的反复吟咏记诵，不断钻研发掘其内蕴的过程中，士子对皇朝统治、社会的看法，对程朱理学，以及个人作为朝廷精英忠臣的认同感便不断强化。所以，八股文对儒家经典传注的文化复制，也就具有使士人在文化层面上向忠君爱民的政治仆从转型的意义。明、清统治阶级用以“治心”之目的便达到了。既然八股文写作的关键在于熟读经典，对题目及程朱传注要有深入理解及心得，我们便可以把八股文称为明、清两代士人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体会。

若从功用来说，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用以培育官员的一种素质训练课程。其经学性可培训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德”，其规范化的文体可对写作者进行正反、顺逆等思维方法及分析、综合能力的强化训练，这就培养了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才”，即使他们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具有功利性、文学性、工具性、规范性、与时俱变等多种性能，但最根本的是其经学性。

经学性是明代统治阶级为控制士人思想而精心设计出的。具有经学性的八股文与科举取士相结合，便成为传输程朱理学的有效工具。

在明、清时代，读书人欲取功名富贵，唯一的途径便是考科举。科举能否考中主要就看你八股文写得怎么样。而经由精心设计而成的八股文话语权又为程朱理学所独霸，你要写好八股文，就先要弄通儒家思想，烂熟《四书》、《五经》。这就形成要想当官，先要写好八股文；要想写好八股文，先要弄通程朱理学、儒家经典的链接关系。受利益驱动，广大士子无怨无悔，自觉自愿地皓首穷经，精心钻研理学思想，程朱理学便程度不等地输入到读书人的脑中，思想定于一尊的局面便得以形成。“无人而不纳之教”，“户有弦诵之声”，这是《明史》中对明代社会攻习儒家

经典风尚之盛的描述。清初学者魏禧更在《制科策》中指出：“明世黜杂学尊孔子，勒《四书》、《五经》为题目，法视前代为独正，贩夫竖子莫不知仁义道德之名。”^①清代张海珊在《送张少渊赴省试序》中也说：“自明太祖定制，以《四书》、《五经》取士，士皆规规焉诵习其中，至白首不能已。以故成、弘、正、嘉之间，士习醇谨端悫，其高者能自通于性命之故，即其材质庸下者，亦无不依仿圣贤成格，以不失为寡过。”^②八股文写作成为士人的自觉追求，标志着程朱理学进入了全盛时期。

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的程朱理学是指导明、清王朝的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根植于封建宗法制制度，以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非常适合帝王统治思想的需要，集聚了经学元素的八股文写作便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受到高度关注。维护和加强八股文的经学性，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任务。明、清两代屡有正文体的谕旨颁布，乾隆皇帝还下令选编了内容纯正的《钦定四书文》来规范八股文的经学性即是明证。

程朱理学本是对心灵的禁锢，在功令的规定下，只允许程朱理学拥有话语权的八股文对人们心灵的束缚就更为苛严，写作者无不感到精神的重压。随着时代的变化，反对思想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开始出现，对程朱理学的怀疑与不满在士人中逐渐流行，这些情绪与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八股文中去，对其理学性造成冲击、削弱，甚至部分颠覆其经学性。

然而，把八股文视为维护其思想统治工具的统治者绝不能容忍经学性的丧失，总会千方百计地采取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措施

^① 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第五十七，光绪二十一年积山书局石印本。

^② 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第五十七，光绪二十一年积山书局石印本。

来恢复并加强八股文的经学性。

于是，人们便可看到，在八股文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充斥着经学性的消长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与时代、科举、社会语境、经济变化、士习、民风、社会思潮相互纠葛，相辅相成，情况极为复杂。然而，只要牢牢把握住八股文经学性消长这条主线，便可清理出八股文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不同作者笔下所呈现出的各种形态，也可分辨出不同思想观念的人对八股文的态度、见解，他们在不同写作理念指导下写出的八股文的特色。于是，明、清八股文的发展变化规律便得以理清。

第一节 经学性是八股文的灵魂

八股文的实质是解经，即解析《四书》、《五经》的义理，自然就具备了经学性。清代朱景昭说：“经学专家，汉以后久绝矣，惟制义尚近经论。”^① 这就是对八股文经学性的揭示。

解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势力的传统学术，主要分为汉学与宋学两大派。八股文主要承袭了宋学的解经方法。

宋学兴起于佛学思想盛行，唐五代战乱造成的名教凌夷，经学衰微之后。程颢、程颐特别是朱熹认为汉学重训诂注疏，他们所采用的对字词本义的探求来解经的方法，已无法开掘出为现实服务的理论，重构社会伦理道德和秩序，必须另辟途径，才能使衰微的经学起衰去弊。在他们看来，孔孟言论，往往有其特别的语境和心境，故其心传，常出于文字之外。汉学的今古文两家，争来吵去，无非是文章之学与训诂之学，都难真实地表述圣人之道。只有抛开传注，直接从经书中求义理，用揣摩体悟的方法，再现先秦的语境，才能发掘出圣贤言论的原生意义。所以宋儒的

^① 朱景昭：《论文刍说》，《原梦轩遗书》卷上，民国二十二年刻本。

解经方法，偏重于个人的理解心得，用的是思辨方式，更多主观色彩，更注重与现实相结合。他们发掘出的义理也更符合统治阶级重整乾坤的需要。

明朝建国之初，又面临着名教伦常大崩溃，新的统治秩序亟待建立的危局，能创制出为现实政治服务思想的宋儒解经原则与方法，自然就被明太祖朱元璋及其子孙所接受，并运用于八股文的创制之中，使之成为控制士人思想的工具。

明太祖朱元璋所创制，并经后人所补充完善而形成的八股文，有四项基本构建原则，从而使八股文集聚了多种理学要素，成为解经的文体。

第一，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摘取，必为书中的字、句、节、章。功令规定，在行文时必须尊题，即文章必须严格遵照题义来阐述；还要如题，即文章的内容、语气、范围均要与题目内蕴相符，不得增减，更不得违背。清代学者焦循说：“时文之体，全视乎题。题有虚实两端，实则以理为法，虚则以神为法，考核典礼，敷衍藻丽，皆其后也。”^① 这项原则，将八股文牢牢地捆绑在《四书》、《五经》之上，是其经学性的基础。

第二，阐释题旨必须依据朱熹，或是被朝廷认可的其他理学派学者的传注，不得超出传注的思想框架，随意发挥，更不得违背。既要依经又要按注，这是八股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八股文构建的第二项基本原则，使八股文与程朱理学对接，将其牢牢地捆绑在程朱传注之上，人为地确立了程朱理学对八股文话语权的独霸，迫使写作者思不出程朱理学的范畴，言必守程朱理学的规范，为明、清统治阶级用程朱理学统一士人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

^① 焦循：《时文说》一，《雕菰楼集》卷十，道光四年阮福校刻本。

第三，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即是说，一题到手，就要化作者为题中人物，展开想象，把自己对题目思考所获得的心得体会，以题中人物的口吻，也即第一人称的方式，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

代圣贤立言这是八股文最重要的经学特征。清代翰林院编修申启贤曾指出：“制艺者，代圣贤以言之也。代圣贤立言不即圣贤之言以涵咏而贯通之，则理不备，必不灵，终不能生新于故而左右逢源。”^①

在他看来，八股文的实质就是代圣贤立言，就一定要体味、贴合圣贤之言以涵咏贯通之，才能从中生发出新的义理来。应当说，申启贤是有见地的，真正把握到了程朱解经原则与方法的精髓。

在程朱等理学大师看来，圣贤典籍，流衍后世，虽文仍是其文，字仍是其字，但时空离开他们说话的语境太过久远，故其常出于文字之外的心传意解，后人就难以领会了。只有精心揣摩体悟，在心目中追想当时的语境和圣贤的心理，才能捕捉到圣贤言论的真实意旨，发掘出其中的微言大义。

八股文要代圣贤立言的原则，便准确地体现了朱熹重个人体悟以解经的方法。它要人们抛开其他先儒的注疏，按官方规定，在程朱传注的规范与约束下，依靠各人对文题的体悟，展开想象，直接从题目所在经文中生发出新的义理，从而达到明道知经，由经穷理，服务现实之目的。这种再生圣贤语境、心境的写作方式，可使写作者思接孔孟，心贴朱熹，让他们的心灵沉浸在孔孟之道所生的典型环境之中而深受陶冶，也最易生发出最符合当道要求的义理来。

清代著名八股文作家管世铭说：“前人以传注解经，终是离

^① 申启贤：《四书文翼序》，乾隆时桂园草堂刻本。

而二之，惟制义代言，直与圣贤为一，不得不逼入精细。”^①作为深得八股文奥旨的八股文大家，这番言论可说是真知灼见。

代言的规定，又使八股文产生强烈的封闭性，拒他性。它只准程朱理学进入，排斥多元文化，从而保证了八股文经学的纯粹性，使其传输的“三纲五常”成为明、清社会士人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伦理道德规范的基本准则。

第四，必须遵循规定的体式。

体式原本是形式问题，但八股文的体式不仅可用以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对解经方式的规范，故也成为经学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功令规定：八股文的“冒子”，即破题、承题、起讲三个部分，要对题目进行概述。不仅以此来训练写作者正反思维，概括分析的能力，还用以检测他对题目也即是经文领悟的正确与否及水平之高低。换言之，就是检测其解经水平如何。所以瞿兑之在《骈文概论》中说：“凡是场屋的文字，都重在一个开头的冒子，要这个冒子动听，才能得主司的青眼。”^②

拿破题来说，不管题目字句的多少，是一个或几个字，甚至几十个，几百个字，是一章、一节或几章、几节；也不管构题的方式如何，是截上去下，或是截此搭彼，都只能用几句话，明代万历以后更规定只准用两句话，联系上下文，将题目的精义概述出来。既要扼定主旨，又要肖题之神。不仅要破得开，即解析出题目要旨，又要破得全，即题中要义无遗漏。“破”即是解，可以说，这是对题目即经文的一种概括性的解析，是建立在对经文的分析领悟基础之上的解经。

承题则规定只能用三句话将破出的题目精义引申说明或加以

① 转引自《制义丛话》卷之一，咸丰九年广州重刻本。

② 瞿兑之：《骈文概论》一六《律赋与八股》，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补充，这也是对经文的解析。至于明万历以前置于承题后面的问题，要说明圣贤为何要发出题中之言，则更要对经文融会贯通才能写好。

起讲要将破题承题所破解出的题旨用人口气代言的方式作深入发挥。其关键在于作者对题目能否作深入的阐发，能否生发出新的义理，为正文拟出阐述的纲要。

八股文的正文部分要用正反、开合的方式将题旨内蕴阐发干净。非标准体式的八股文即经义用的是散文化的句式，而标准体式的八股文则是由两两对偶的四个段落组成。这四个段落分称为提比、中比、后比、后二小比。每比分出股与对股，共计八股，故将之称为八股文。这四个有着起、承、转、合逻辑关系的段落的设置，表面看来是个结构问题，表达方法问题，瞿兑之在《骈文概论》中说：“凡是说理的文字，愈整齐愈有力量，复反复愈易明白。”^① 但实质上是一个内容问题。整齐对偶，正反开合，反复阐述的八股文字，依功令规定，是用来规范写作者一层层深入地将题旨阐述干净的，其经学性更为凸显。对偶反复，只不过是用以增强其气势力量，明白畅达而已。

明代嘉靖以前，用以收束全文的大结部分可兼言时事，这是沿袭宋经义文的格式，更是对汉、宋解经讲体用，贵经世原则的具体运用。后来大结虽废，但代替它的收结仍在解经，因功令规定，收结时要总括上文或推阐余波，题有下文者，要照应下文，非对经旨有精确的概括不可。

八股文构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是以功令形式规定的。在它的规范下，八股文使用了理学的解经方法，其构成部分，无论是内容还是体式，都具有经学的元素。写作者只要遵循功令，所写

^① 瞿兑之：《骈文概论》七《书札与徐陵》，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出的八股文必然会是解经之文，充满经学性。所以清吕留良说：“非时文不足明道。”^①

八股文经学性的作用是在科举考试中得到充分展现的。

明、清的科举可用“三三八”制来概括。

第一个“三”，即三级学校制。明、清两代的学校分为三级：中央的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分布城乡的社学、义学、私塾、蒙馆即各种公私小学。

第二个“三”，即两个三级考试制。第一个为县、府、道（清代称院）三级选拔生员即秀才，获取科举资格的童子试；第二个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选制。

“八”，即八股文。在明、清科举中，它是起着灵魂作用的。

明、清制度，养士在学校，取士在科考。非国子监的监生、贡生和府、州、县学的学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要进入这些学校必先考取生员（监生中的例监是用钱买的，也可参加乡试）。只有经过科举录取的人才能授官。考得上考不上，从明代中期以后，主要，甚至全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所以明中叶起至清代的学校教育、童子试和科举考试，全都围绕着八股文写作在运转，形成一个以八股文写作为中心的系统工程。换言之，就是将科举与八股文捆绑在一起，形成要想当官，就必须先写好八股文的简单关系。而功令又将八股文与《四书》、《五经》捆绑在一起，要想写好八股文，必先熟读精研儒家经典。两个捆绑，链接成一种一目了然、人人明白的功利关系：要想当官，就要弄通《四书》、《五经》。在功利的驱动下，明、清的士人便潜心于《四书》、《五经》之中，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背八股，写八股，钻八股就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明史·选举志》中说明代社会“户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攻

^①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习儒家经典与八股文，以求当官发财的社会景象。八股文写作在明、清社会便成一种普及经学的手段，成为大众化的经学学习过程。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明代万历时有生员 50 万。那么，参加过童子试，攻读过《四书》、《五经》的童生至少有数百万之多。^① 明丘濬在《会试录序》中说及理学：“我皇朝之兴，首表彰之，列圣相承，造士用人，纯用是道。至于今日，益隆益备，横经之师，遍于郡县，执经之徒，溢于里巷，明经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经术以后所未有也。”^② 也是对当时经学普及状况的描述。这种为求取功名而努力去攻习八股文，为写好八股文而自觉自愿去攻读经书，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心贴先圣，体悟还原其语境，发掘隐蔽于其言论中的原生思想的行为，久而久之，自然就使儒家思想占领了士人的头脑，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观就会逐渐树立，八股文经学性的功用就显示出来。用八股文培养、选拔出来的官员将获得的理学思想运用到现实政治层面，明、清社会以理学治国的效能便得到充分发挥。

但是，这种为统一士人思想而人为设计出的经学性具有强制认同性，给八股文造成了难以根治的弊端。

010

首先，它造成了内容的单一，严重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了人的才华个性。文章刻板，少有意趣，使相当多的人视八股文写作畏途。明代张岱说：“诸体之难，无过制义，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者也……虽以真正英雄，屈首此道，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③ 这番话深刻地揭示了经学性的弊端。

其次，经学化造成的八股文内容的单一性，使得绝大多数士

^①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七附《生员额数》，岳麓书社，1994 年。

^② 丘濬：《琼台诗文会稿》卷九，明天启重编会稿刻本。

^③ 张岱：《石匮书·科目志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影印本。